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许明
主编

《上海思想界》 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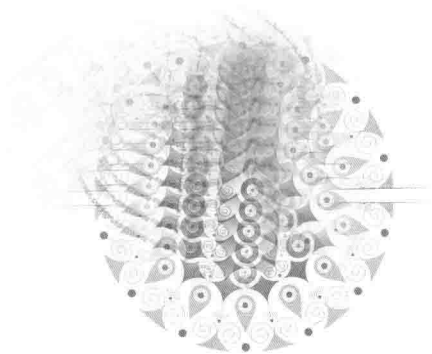
(2013—2017)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思想界》精粹

(2013—2017)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许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思想界》精粹.2013~2017/许明主编.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03-1

I. ①上… II. ①许…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7037 号

责任编辑 秦 堃 肖 峰 刘华鱼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上海思想界》精粹(2013—2017)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

许 明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42
插 页 6
字 数 720,000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03-1/C·559
定 价 180.00 元

前言

许明

2013年上半年,上海市社联党组决定将社联原有的一些资源整合使用,创办思想性的内刊《上海思想界》。我受邀担任主编,并在这个平台上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了“中宣部舆情直报点”。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个思想性平台在上海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发出了它应有的光芒,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每年十期,每期十万余字的月刊《上海思想界》按时出版,《上海思想界专报》作为智库成果,屡获嘉奖,可以说,这已成为全国思想理论界的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综观我们五年来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是有一条编辑主线的,是有自觉的理念的,在此正好可以说明一下,以便与思想理论界的同行沟通。

中国的学术人员之多,搞思想理论研究的人员之多,正成世界之最。无疑的,研究成果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翻译、研究、写作、出版,已成为一个特殊的非常热闹的行业,说现在已经学术产能过剩并不为过。

如此这般,还要搞一本思想理论型的月刊,前景何在?能说出什么新话?有什么新的开拓空间?值得我们这些健全的思想者为此去付出?

如果从1978年算起,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已经演进了40年时间。中文学科的现代文学学科,也涵盖30年左右,而研究它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已经数以万计。所以,相比较而言,当代思想史已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而真正地科学地研究它的人们,寥寥无几,它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还不曾有规范的思想史的逻辑行程出现。

思想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互动关系。现在看来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特别是对一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而言。中国再大,在全球视野中它也只是一部分,在互联网时代,它所产生的思想更应是世界精神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现状激发产生某些思想,也反射和映射了某些外来的和历史上有过的思想。所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应用互联网时代的全球眼光去扫视。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文化大转型的一个特殊的起点阶段。第一次社会—文化大转型,是先秦到宋明之间的转型,中国思想从诸子原儒到宋明新儒,大一统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建得以完成,其间花了近千年时

间。宋一明这个历史平台对应的正是处在黑暗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而中国以洋洋自得的文化满足在构建一个诗意的人间乐园。

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成为中国中世纪的两杆旗帜。宋画、宋瓷、宋词、元代的青花彩瓷、话本、戏曲、明代的小说,一个华丽多彩、诗性而又世俗的文化样态与制式完备的皇权专制制度相得益彰,成为世界史上中世纪的奇观。

花开自有花落时。

明末开始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进程,被打断了。西方各国的机器工业生产和地理大发现展开时,中华大地上时光返照地呈现康乾盛世。康雍乾三朝,当时西方正在开拓工业革命,其成果正孕育。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农耕世俗社会,其实力正达到兴盛阶段。相较之下的繁荣,麻醉了统治者的心智。乾隆六下江南巡视的时候,正是18世纪下半叶,他就没想到用别的办法去了解一下世界。

乾隆浩浩荡荡的人拉风吹的船队运行在大运河上的时候,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巡视江南,春风满面,带着苏杭美女回到京城后不久,第一台蒸汽火车在西方出现了。清王朝还在以冷兵器时代的骁勇自傲时,装填火药的枪炮已经征战到全世界。

在挟现代性狂风的工业化浪潮重压下,中国终于落下了千年帝制的帷幕。社会—文化转型不得不加快了时速。

20世纪的百年,是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百年。中国的志士仁人完全清楚自己的民族处在历史演进的滞后阶段。而只有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之时,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才显露曙光。

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选择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被证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多层面依次展开。可见的成果是经济快速增长,骄人的成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域外人士讲,中国变化的全球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估计。这个巨变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

现在,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指挥者的理论自觉。从底线思维的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划出的“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的红线,是科学理性、符合国情的。“不走老路”,是因为改革就是告别“继续革命”的老路;“不走邪路”,是因为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路径。

这无论从指导思想上、方法上、实践上都说得通,而探索一条新路,需要新的理论。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入新时代,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融入全球的中国,更加主张“自由贸易”的中国,也是更加加强党的领导,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更需要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2018年的博鳌论坛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力度之大,几乎使世界震惊。有人说,这是“第三次改革开放浪潮”。而新一轮改革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已经开始纠正不计代价的过度开发的弊端。

这实质上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打扫奥吉亚斯的牛圈,以获得再一次前进的扎实基础。

实践已走在理论的前面。

中国理论界原创力的不足是一种劣根性。自孔夫子成为“大成至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我注六经”式的思维方式已有历史惯性。目前的中国理论创新空间,并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不想创新、只想照搬、只会照搬各种教条的人才会觉得无话可说。

还是那句老话: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新路如何走?而我们的任务是:如何从理论上回答正在走的“新路”的合理性、逻辑性?

回到本书的选编目的。

《上海思想界》自开创之际,就明确了要研讨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一起成熟,而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是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新的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的。理论上的难题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与资本市场如何内在地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的体系?这不是理论在塑造实践,而是实践在呼唤理论。我们是既要社会主义,又要市场;既要公平公正的分配又要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既要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又要浓厚的中国传统的积淀……

这不是中国人在别出心裁地另辟蹊径。

其实,中国是在回答就马克思早年的提问:东方落后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如何越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

其实,中国在探索一条20世纪西方工业化完成以后,后发展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路。

整个20世纪,中国都是在探索。各种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派别都是在实验自己的

主张。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逐渐占据了历史先机,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实践的40年,这条“特色”道路日趋成型。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经历了艰难的起始阶段以后,在近半个世纪中正以明快的脚步向胜利的未来迈进。

本书刊发的是我们五年来在围绕这个主题的思考。这里的讨论分散在各个逻辑层面上,但其核心层面是“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讨,这是始终坚持着的。

我们并不是说这种探讨已经有了圆满的结论,而是说,这种探讨是围着真问题在“舞蹈”。迄今为止,我们的学术水平和思考力度,只能“到此”,但“到此”也难能可贵了。

我们的努力,至少打破了“非左即右”。听听第三种声音,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目 录

前言	1
中国道路与中国改革	1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	42
全球化:新态势、新特点与中国发展	67
中国话语与理论创新	86
学科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建设	112
当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144
文明基础、文化自觉与中国道路	169
市场与社会主义	194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42
消费文化与意识形态	266
新时期的经济学:问题与前景	294
《资本论》与《21 世纪资本论》	326
新常态下的国企与国企改革	351
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城市化研讨会	398
国家金融安全	44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	456
国企改革理论研讨——以联通混改为例	488
社区基层治理	521
科学进步与人文、社科发展	541
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	572
当前中国电影的创新发展与市场走向	605
传统价值的当代意义	636

中国道路与中国改革

(2014年1月)

参会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许明(《上海思想界》主编)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维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教授)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雄:谈中国道路首先要谈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用成功学的概念来说,它是成功的。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出现西方人常讲的中国崩溃论,反而做到了发展的最大化。可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存在即合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得到了显现。既然这个道路是成功的现实性存在,那么它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需要反思这个存在是怎么形成的。它涉及存在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不等于到最后一定会成功。

追究存在的可持续性,就要用历史视野来看它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黄力之:我个人觉得,讨论中国道路问题还是要从历史性的概念开始讲起。中国道路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世界历史的背景,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背景里,世界的主流、主体或者说是重要部分,是西方世界。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2013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报》发表的文化企业家访谈,解析西方国家对外颠覆模式。用那么大的版面来谈这个让我感到很惊奇,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学术含量,让人有时代错乱的感觉。这些都来自所谓“现代性”的概念,这不是外星人的概念,也不是中国人突然想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在这种背景之下,把西方

的和平演变的颠覆作为主题来谈,我个人觉得值得深思。

进一步思考,邓小平当年的本意,只是不能挑战中共的领导权,并不是回到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对此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保证领导权的底线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就是新权威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

如果把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对接,矛盾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调和,但如果只是讲领导权的底线和市场经济对接,就简单多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要慢慢进入自觉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社会报》发表的访谈虽然没有学术意义和价值,但是它还是提出了方法论的视角,就是如何从中西方的关系来认识中国道路的问题。讲中国道路,离不开中西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道: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中国向西方学了不少,但是行不通。他当时已经注意到了这是中国的特殊性问题。西方曾经是中国,包括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学习对象,所以他叫先生,先生和学生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关系层面上,是先生打学生,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西方关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中国一开始学西方,但是学习的好意换来的是他的侵略、掠夺,形成了先生打学生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一方面要学习他,另一方面却跟他处在长期的对抗的关系里面。在20世纪,中国对西方由相信变成了不相信,走向了对抗。所谓相信是指1840年以后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力量,相信他,学习他,这是世界历史的支配作用。所谓不相信是西方对中国的不平等关系,包括后来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俄国人不止在观念上影响中国,而且非常有效地策动了中国的革命,俄国对中国20世纪的道路影响非常深刻。

许明:讨论开局非常好,提问也非常好,即如何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理解中国模式。毛泽东当年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解释,老是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反侵略这样的问题。

西方文明对东方来讲不仅是侵略性文明,也是传播性文明。这里面学习和反抗的关系怎么解读?解决得好不好?是不是影响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我认为在20世纪我们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中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我们对挨老师打这一面比较重视,但是向老师学习的一面,也就是现代性的扩张这一面,对它的合理性的解读可能是片面性的。

黄力之:我接着再讲两个事实。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坐在日本的新干线上讲: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看到了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现实。要现代化就要学这个。所以他接下来讲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里要重新学习的意思非常清楚。第二,关于对抗,邓小平有新的表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对美国人讲:美国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相信的意识形态,是要摧毁像美国这样的政府,这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而是60年代以前的观点。他的意思是我现在不是这么想的了。

张 雄:中国道路问题越来越需要理性的反思,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某些缺憾的教训,我们国人有了对道路的思考,当然也关涉对中国精神、中国的发展模式等问题的思考,这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发展,他们的评价由否定、怀疑转向了深入研究。美国有人做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跟中国人交往,这和以前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发问,构成了对人类发展观念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首先包含着西方从近代化到现代化这样的发展道路,包括它的发展理念、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问题式的思考和问题式的批判。中国这三十五年走的路坎坎坷坷,但是总体上是上升趋势,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这是中国道路讨论少不了的背景前提。

反思道路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道路的本质寓意是什么。自然科学探讨路径,社会科学在反思道路,历史哲学也在寻找道路,道路究竟是什么?一个社会通过自身的历史变迁所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实践特征和它的精神路标,一旦被历史塑形,被时空放大,被特定文化所定义,被一种宏大叙事所证明,它的道路意识便有了存在的诉求。所以,作为反思对象的中国道路,它的本质寓意应该是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回答,是中国发展个性内涵的确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道路问题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发育的特质,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没有这么深刻地被认识。我感觉到道路问题的存在,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现代性发育的特殊阶段才出现的,不可能是永久性的问题。道路问题最早是因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巨大变革,尤其是通过殖民而获得的财富效应而彰显,它使得一种崭新的文明范式在西欧备受关注。所以物质的流转,乃至精神的流动的方向,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特定的发展模式和英国道路符号的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第一个对道路问题进行反思的国家应该是德国。当前对道路

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直接关切现代性的发育,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等问题而提出的。

当时德国倍感现代性发育的沉重压力,在英国资本强势的运动空间里,德国人感到如果成为英国资本发展的附属国家,德国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永远落后。所以在那个背景下,大批德国的思想理论精英深刻地反思德国发展的道路问题,最典型的首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他提出了德国道路,甚至提到了德国的民族精神、德国发展的模式等一系列重要的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问题。

许明:在马克思的论述当中,德国、俄国、中国,这是一连串的比较落后的发展范式。德国模式很少有人关注。

张雄:紧随其后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与深度,既解析了德国思辨哲学革命对德国现代性发育的影响,更从历史发展的宏大尺度,尤其是他晚年对历史非常态进化的研究与构想,深刻地阐述了世界发展呈现多元、异质的规律学说,同时也解构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理论模式,从而助推了德国以及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上现代性发育的快速成长,也使得世界历史进入了多种道路、多种发展模式的时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发展道路的思考乃是民族或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们中国为什么现在热衷于讨论道路的问题,而美国等国家并没有发动相关的讨论,这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对自身发展问题的敏感,由此而生发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差距感。如何自觉地把本民族历史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由差距导致自觉奋进,如古人曰:忧患兴邦。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表现。

二是发展的主体意识。要在快速吸纳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不丧失本民族发展的主动权,这才是构成对道路意识问题有焦灼感的关键。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性发育的全过程,它们有着强大的资本实力和文化张力,美国这些国家已不需要把发展道路问题作为一门显学来加以讨论,它的道路就在那里,不需要做大量文字上的讨论,它们不把自身发展道路问题当作自身可焦虑的问题,而热衷于关注如何让别国去复制它们的道路和模式,以便于在对全球发展资源的掌控中始终获得主动权。

当下中国强化发展道路意识的必要性,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国人担心过分地借鉴、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和经验,会导致民族自信的丧失。问题恰恰是出在这里,即为什么我们要固守道路意识的概念?因为在经验的、感性的、实体的变化社会里,实际的脚步往往不听理性的招呼,现

实的运动极易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所牵引,而实际上,中国社会进步的确保,必须要有精神的自觉提示和观照。扛什么旗,走什么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必须搞清楚的道理。二是中国深度发育现代性,必然关涉中国道路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实质就是工业符号,工业主义精神,工业哲学的彰显,它有可能诱导中国重蹈西方工业革命之路。而中国唯有按照中国人自己所锤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主义发展范式走下去,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一定要讨论道路问题,防止走到西方历史上的老路上。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决定中国当下的发展必须要有极为清晰的道路设计和发展模式的定位。因为中国今天搞的现代化不能完全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那套路径,一定要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它对道路问题非常敏感,要保持清晰的道路设计和发展模式的属性与定位。

许 明:好,这一段非常清晰,对发展道路意识的必要性的阐述让人很受启发。马上有一个问题,中国这样的道路为什么一定要跟马克思主义相关?为什么一定要跟社会主义相关?

张 雄:我觉得马克思整个的一套思想在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的概念上是最具有特色的,最能够体现出历史哲学的宏大尺度,他不是站在西方模式的基点上来回答问题的。

许 明: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包括现在正在走向西方模式的后发展国家,它们不经过马克思主义,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不是也走向了现代性的发育吗?

张 雄:对。

黄力之:还是有一些偶然性在里面,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过来以后,它对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传播都是平等的,影响是均等的。

张 雄:不是说全球听了马克思的话现代性就发育了,就走得很顺,而是马克思深刻地揭示、批判解读了西方现代性发展规律性的问题。

我建议应该谈一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道路的关系,偶然在什么地方,必然在什么地方,他们两个谈的都是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的问题。

许 明:张雄教授刚才整个阐释的是普遍性的现代性的道路,这里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阐述也适合其他国家,适合中国,也适合韩国。

张 雄:讨论中国道路问题,尤其对道路问题的敏感和意识觉醒,它有一个重大的背景前提,就是一个国家从传统性的社会向现代社会发育。像我刚才讲的,历史上为什么德国对英国有一个道路问题的焦灼,就是因为有现代性发育的背景,所以道路

问题的讨论一定要聚焦在现代性发育的背景上。

陈学明:为什么现在如此热衷于讨论中国道路?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增强道路的信心,这也说明现在大家不很自信,正因为不自信了才提出一个自信的问题。为什么不自信呢?我认为首先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回顾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看,可以说是成功了,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有目共睹,而且前所未有。如果真正面对事实的话,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对这一道路产生怀疑呢?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呢?还有什么理由对中国的未来如此悲观呢?

许 明:悲观的表现包括移民,转移资本。

陈学明:这里边确实有一个立场问题。一些人脑海里还是“月亮还是西方的圆”,总希望中国完全按照西方的路子走,总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这样,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有别的道路,因为中国道路前面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修饰词,就百般不满,横看不是,竖看不对,总是用批判性否定性思维来对待中国道路。对这些人来说,只要中国没有被完全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怀抱,哪怕做得再好,也只能是一个被批判、嘲讽的对象。所以,现在我们评论中国道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至今中国走这样一条道路,从总体上看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而要正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者当然必须具有正确的评判标准。头脑中的价值标准迥然不同,面对同样的事实,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价值标准又是与其所持的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中国道路的是与非,要看与什么人在一起讨论,与所持立场、价值标准基本相同的学者一起讨论,跟与所持立场、价值标准完全不同的学者讨论,完全是两码事。要科学地、理性地对中国道路作出判断,真正搞清楚中国走这样一条道路成功在什么地方,何以取得了成功;在走这样一条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失误,如何避免这些失误;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对这条道路还需要加以怎样的修正、完善和发展。

许 明:道路问题的讨论背后依托的是现代性发育,而现代性发育触及现实,触及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陈学明:刚才许老师提及的移民,转移资本,真值得我们关注。我就不相信,一个当官的,一个富豪,整天想如何把自己的子女、财产转移到国外,整天想如何有朝一日自己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乐园”去当“寓公”,能够对中国道路有信心。我们不屑于与这样的人讨论中国道路问题。

许 明:人们反对抽烟而不反对汽车是不可理解的。抽烟会产生 $PM_{2.5}$,但是,汽车尾气对 $PM_{2.5}$ 贡献率远远超过抽烟。同理,我们只关注 GDP 而不关注更本质的“道路”问题,也是不可理解的。

陈学明:我觉得要真正认识中国道路,有必要回顾一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当时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模式已失去了吸引力,急于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急于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为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一条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以民主政府加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始于 20 世纪的拉美国家的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运动,实际上也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卷入这场改革运动的一些拉美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大刀阔斧地开放市场,并把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把整个国家都卖光了”,于是这些国家失去了对经济命脉与整个社会应有的管理和控制,最终爆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与“休克疗法”带来的社会经济大倒退、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灾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与这三大失败相伴随的是“华盛顿共识”影响力的一路下滑。而正当一些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实施激进改革之时,中国却没有完全跟在“华盛顿共识”后面亦步亦趋。中国也在进行改革,但我们的改革是“渐进的改革”,中国正是通过这种“渐进的改革”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对道路的选择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华盛顿共识”,而是努力开创自己的发展模式,与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没有跟在“华盛顿共识”后面亦步亦趋的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人民在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经验自主的、创造性的消化和吸收,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如南美、拉美,它们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模式,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来发展。而中国走另外的道路,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社会资源建设国家,推进现代化。这两条道路哪条成功哪条失败实际上很清楚。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一段当代世界历史,我们千万不能遗忘。这是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心的宝贵资源。应该说中国道路产生的效果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敢于不敢于承认中国道路的成功的问题。

许 明: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

陈学明:承认中国道路成功,就意味着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否定,意味着对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的承认。

许 明:你的问题是合理的,但是答案不一定合理,这个答案正是很多人都质疑的问题。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认可,对中国道路所有的核心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对市场经济等的肯定,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性和发育的重要标志,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的人,那么多理论家对中国道路还打了一个大问号?

陈学明:因为这些人渗透了资本主义的偏见。对你所说的中国道路的基本要素,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等,他们可能认可市场经济,但对其他要素,他们是不会认可的,也不可能认可。有些人把中国道路简单地概括为“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表述,这一表述确切地反映了中国道路的特征与内涵。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是出于策略考虑而加上去的,早晚要去掉的。去掉了就不是中国道路了,而完全是西方道路了。

黄力之:问题就在这里。

张 雄:用自由主义讲中国道路不行,但是我们自己现在还要把市场经济性作用往前推。不是说走到这里就行了,而是还要往前走。

陈学明:不要忘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市场经济往前推。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领导,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讲得十分清楚,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黄力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个分阶段前进的问题。

张 雄:有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承认市场配置起决定作用,好像已经是往自由主义的经济套路上走了。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说强调决定性作用,就必然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个决定性作用是有一系列的约束条件的。

陈学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我们看到一方面越来越放开,另一方面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了。把市场该承担的交给市场,而政府应当承担的也坚决承担下来。在一种倾向盛行时,要注意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实践证明,在中国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一种政策来了,中国要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一些人千方百计对这种政策、这种推进往自由主义方向去说,去靠。“左”派这样做是为了把这种政策、这种推进解释成自由主义后有理由加以反对,右派这样做为的是让这一政策纳入自己的轨道,即西方自由主义的轨道。

张 雄:西方学者也在反思,所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它的范围和边界究竟是什么?中国现在已经提出这个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走上新自由主义这条路了。

许 明:还有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问题。

陈学明:我下面还要讲。我先提出问题来。

张 雄:现在对你的结论,包括我说的质疑,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部成功,应该总结经验,总结模式然后推广,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中国道路过去是试探性的,实验性的,甚至是具有危险性的,有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发展道路上。我现在也讲点感性的,在这个体制下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贪污腐败。这种情况是不是你讲的中国道路的必然的伴随品,还是偶然的?如果是必然的,必须进行反思,必须考虑现代性扩张当中产生东方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邓小平同志 20 世纪 80 年代所指出的,我们党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估计不足的问题。

张维为:我来回答腐败的问题。没有一个大国或地区在迅速崛起的时候,在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可以避免腐败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先从经验层面来看,美国、英国、法国都是这样,主要是对财富爆发性增长的监管跟不上。以为采取西方的模式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是天大的笑话,这在经验上也不成立。最典型的就是“四小龙”,现在两个“小龙”(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明显采用西方的模式,另外两个“小龙”(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没有采用西方一人一票的模式,结果腐败谁最严重,当然是前者严重,严重得多。那么这是从经验层面来说,当然理论上也可以说明。

下面我来讲讲中国的道路问题,我一直是属于有道路自信的,不是一般的自信,是超级的自信。所以说你们找我搞一次辩论我都愿意,可以理性对话,理性地进行辩论。

自信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国际横向比较中的成功。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成功,超过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综合的成绩。在消除贫困方面,世界脱贫的 80% 是在中国实现的,超过所有其他的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转型经济国家的整个经济到现在为止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以中亚五国为例,俄罗斯可能刚刚超过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前三十年就是 18 倍,这是指 GDP,当然还有其他的指标。另外就是跟发达国家比较,我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对国内知识界的不自信很不理解,特别